经济与经济学的理论思考

刘新建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本文讨论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资本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探讨了经济科学学科体系、经济增长动力、服务业产业发展规律、经济分配机制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这些范畴和理论问题的清晰化有利于增强经济学学科的科学性水平。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经济增长；服务业产业；收入分配

分类号：F014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Economy and Economics

Liu Xin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economics such as subject research objects,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capital, and explores several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economic science, economic growth drivers, development laws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economic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se categories and theoretical issue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economics discipline.

Key words: Economic research objects; Economic growth; Service industry; Income distribution

现代经济学的内容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从其知识的科学性水平看仍然处于钱学森所说的前科学时期。作为经济学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虽然已有近 200 余年的历史，但是，许多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仍然是不成熟的，范畴体系中的一些关键概念是不确定和不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设近 40 年，理论体系仍然处于萌芽期，大量的范畴和理念需要深入的进一步研究，使成为新的理论范式。本文从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经济增长概念和增长规律、服务产业生成与发展、收入分配机制等四方面深入讨论了一些基本范畴，以此抛砖引玉。

一、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经济科学学科体系

关于经济之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人要衣食住行，这就是需求，然后就得生产，这就是供给，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构成一对矛盾，因此，凡是与生产消费矛盾有关之事物都可以称为经济事物[1]。在纯粹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二者的矛盾是生产限制了消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与消费脱离了直接联系，转化为供给需求的关系，而且中间环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止一层；另外，经济关系中增加了更加复杂的金融关系。由于中间关系的复杂化，供求矛盾从而生产消费矛盾的解决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信用制度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2]，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根源。

所谓经济学就是关于一定范围内经济系统的生产消费矛盾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3]。按不同的经济领域和专门问题，就形成了许多的经济科学学科。这里强调一下经济学和经济科学的分别。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初学经济计量学时，很纠结“econometrics”这个词，是叫计量经济学还是经济计量学好。那时的教科书上一般都认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是“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或客观规律”。在我的内心对这种观点不认可，不愿承认它是一门经济学，所以，一直喜欢称其为经济计量学。实际上，需要区分经济计量学本身的研究和应用经济计量学模型方法对经济或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对经济计量学本身的研究创造的知识属于经济计量学这门学科，其本质上属于应用数学性质的。应用经济计量学模型方法确认特定经济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某些特征的研究属于实际经济问题研究，其研究成果服务于特定经济管理问题或经济史判断问题。应用经济计量学模型方法对某个一般经济学理论命题的实证研究属于经济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填充经济学知识体系，可以属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活动也就属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研究。从 econometrics 这个特定学科词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所说的经济研究或经济学研究应该进一步严谨细分界定，如果继续模糊下去就使人感觉名不正言不顺。

根据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的观点，全部科学技术知识都可以分成三个基本层次：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在基础科学之上还有哲学[4]。其中，基础科学是关于客观事物的规律的知识，应用技术是人类实践的方法步骤知识，技术科学是应用基础科学理论对应用技术科学性的论证知识①。因此，我们把关于各种各类经济系统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知识称为理论经济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学原理。一切创造经济学原理知识、发现经济规律知识的研究都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这就是我们前面的说法；一切应用经济学原理知识为经济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研究称为经济研究或应用经济学研究（直接的应用研究提供管理咨询报告，间接的应用研究提供实践分析报告及经济预测）；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属于应用技术知识，特别是其中的数量分析方法构成数量经济学技术知识体系；发明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属于技术科学研究，其成果构成经济研究方法论（把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经济学研究统称为经济研究）；数量经济学是经济研究方法论的分支学科，经济计量学又是数量经济学的分支。经济学原理、经济研究方法论、经济研究方法一起构成经济科学知识体系。

这里还要区分经济科学分支学科和经济学教科书。一门学科就是关于一类特殊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在一门经济学教科书中可能包括多个层次的知识，不仅有经济学原理知识，还有应用原理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管理学知识，还有发现经济学原理的方法知识，许多时候还有相关的哲学层次知识。关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讨论属于哲学问题，它不可能用该学科的本身知识形式逻辑地解答。金融学等被认为是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就是这种混合性非常强的教育教学学科，这类的著作也供一般读者学习经济科学知识。实际上，对知识进行分门别类是为了知识管理、应用参考和学习知识的方便需要，而实际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完全可以打破学科的分界，这正是各种跨界研究出现的内在原因，也是处理复杂巨系统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需要。

---

① 运筹学是典型的技术科学学科，其本身的知识不包括任何客观系统的规律，其中的论证证明也不包括任何新数学知识的发明和发现，完全应用的是已有数学知识；其论证的标的是最优化模型解的存在性、唯一性、最优性等特征和解法的科学性。

在经济科学学科体系中，除了经济学原理和经济研究方法论学科外，还有两门历史科学学科：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门学科实际上是交叉学科，既属于经济科学也属于历史科学。实际上，以任何一门学科为核心，都可以形成包括本体学科、方法论学科和学科史的知识体系，不妨称之为××科学，所以，现在有物理科学、数学科学、历史科学，等等称呼。大多数社会科学都会有两门历史科学学科，即对应的社会实践史和学科思想史。在经济科学中，有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说史两种学科，学说史是思想史的一部分。经济法学和经济行为学（认知经济学）都不属于经济学原理学科，其中心词分别是法学和行为学，但是可以属于经济科学，属于交叉科学。

在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中，除了从应用技术到哲学的四个层次之外，还有一个前科学层次。这里的知识都是科学性处于待验证的阶段，属于经验或猜测知识，通过验证有些会转化为科学技术知识，有些会被认为是谬误认识，从而被开除出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认为，中医中大量知识处于这个前科学阶段。实际上，经济学知识总体上也处于前科学阶段。

二、经济增长的含义与增长界限

持续经济增长是几乎所有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经常落入宽松或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争论中。在这种争论中，大多数人忘记了经济增长的"初心使命"，即为什么要增长的问题，进一步是对什么是增长的认识模糊不清。

在 2021 年年初时，国内外各种机构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当年增长做出了乐观的估计，如 IMF 认为世界经济总体增长可达 5.5%，美国经济增长可达 5.1%，中国经济达 8.1%，对印度的经济增长预测更是达到 11.5%[5]；在 2021 年 4 月时更将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为 6%，7 月时对美国的预测达到 7%，甚至有机构预言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中国。但是，后半年的经济形势发展逐渐下滑，新冠疫情一波高过一波，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此时，各个机构对 2021 年和 2022 年的预测已经陷入了悲观氛围，纷纷下调预测。于是，人们在一片悲声中迎来了 2022 年。

在 2021 年 2 月时，我曾对经济形势给了一个大致估计："2021 年的经济首先是恢复，恢复的第一步是达到正常。2020 年世界经济衰退约 4%，假如（2021 年）潜在增长率与 2019 年相当即应增长约 3%，如果是完全恢复的话，则 2021 年增长率应接近 7%；考虑到疫情和衰退对生产力的破坏，2021 年世界经济总体应增长 5-6%。这只是恢复！美国经济 2020 年衰退 3.5%，2019 年增长约为 2.3%，美国经济从恢复角度看，2021 年应增长约 5.8%。中国经济 2020 年增长 2.3%，2019 年增长 6%，从恢复角度看，中国 2021 年增长应为 3.7%；2020 年中国投资增长 2.9%，带来的新 GDP 增长应在 2-2.5%，所以，2021 年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长是（3.7+2.5）%=6.2%。中国经济 2021 年的增长要达到 8%甚至 9%，这需要中国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从 2022 年 2 月各机构公布的 2021 年经济增长估计数据看，全球经济总体仍然没有从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中完全康复，只是基本恢复（IMF 发布是 5.9%，世界银行发布是 5.5%）；美国经济是初步恢复，增长了 5.7%，但是使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严重通货膨胀，达 7%；中国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增长，总增长 8.1%，但也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实际上，除了中国，大多数国家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维持经济增长，以至于造成新冠疫情长久不灭。

关于经济增长这件事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生产能力的增长，这正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概念。对经济来说，生产能力是由固定资产决定的。同样的固定资产，单纯依靠劳动力的努力和效率的提高增加生产，其增长率在一年之中非常有限。而增加的固定资产（约相当于投资）要形成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一般有个延滞期。部分可以在一年以内实现设计的生产能力，这一般被称为短线投资，但大多数特别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投资，延滞期都要在一年以上（虽然个别在 10 年以上，实证发现平均在 2 年左右）。所以，正常情况下，某年的经济能不能实现增长要看前一年有多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固定资产首先要补偿前面生产对老固定资产的磨损消耗和无谓破坏，其次才是增加成长的生产能力。以这个道理来看 2021 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会明白：2020 年是个非正常年份，不仅没有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衰退，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实现 2019 年提供的成长生产能力，而且有部分老的生产能力也没有利用。因此，2021 年只要能充分利用老的生产能力就有增长，再能利用 2019 年投资增加的生产能力，增长就能再进一步；假如 2020 年还有相当的新投资，那么，2021 年就会有更多的增长。也就是说，2021 年的增长可以由三部分组成：老能力的恢复性利用+2019 年投资的利用+2020 年投资的利用。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仅仅是恢复利用老的生产能力和部分利用 2019 年的投资能力；美国经济也仅仅是比较充分利用了 2019 年投资增加的能力。这是从宏观效果来看，在微观上当然存在新老替换，含有 2020 年投资的利用。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则要好很多了，不仅充分发挥了老的生产能力，而且很好利用了 2020 年投资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有效利用了 2021 年的短线投资能力。另外，2021 年美国通货膨胀严重，完全是因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 2020 年没有储备好生产能力（即投资不足）。不仅是美国投资不足，而且是整个世界处于衰退之中，投资不足。

回顾 2022 年世界经济，当时各机构的悲观预测不是没有道理。对全球总体而言，在基本面进一步向好的情况下，可以恢复利用的生产能力带来的增长不到 2%，即使能恢复 2019 年以前的增长能力，总增长能力也难以逾越 5%，更何况新冠疫情对劳动力资源和老生产能力都造成了明显的破坏。4 月份时，各机构对 2022 年增长的预测都在 4.5%以下。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生产能力的破坏不可低估，再加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困境，美国经济 2022 年增长率应在 3~4%，这已经是美国经济的正常中上增长水平了。中国经济由于 2021 年的超常发挥和 2022 年世界经济的低增长率，2022 年的增长率也会有所回落[②]。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量上的变化，也必须配合质的提高，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很显然，假设人口没有增长，也就是劳动力数量没有增长，再假设已经实现充分就业，即劳动生产率都达到了最优水平，那么在新增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更有效即单位固定资产的生产率不能更高的情况下，新增生产能力的效能是不能发挥出来的，因为没有富余的劳动力转移过来使用它们。所以，一切有效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必须是伴随着科技创新的实现，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

就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而言，最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难以较高，2%甚至 1%左右是未来常态，经济危机之后或新冠疫情一类的灾后时期，作为恢复性增长会高一点。所以，在未来的正常情况年份，世界经济的总体平均增长率

[②] 2022 年的世界经济已经落幕，各国的 GDP 增长率都尘埃落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 年 7 月公布的数据（IMF：世界经济展望：坎坷的复苏，2023），2022 年，世界经济总体生产总值增长率 3.5%，美国为 2.1%，中国为 3%。

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必然的。但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机制下，跨国资本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据控制地位，最发达国家会依靠资本收益实现国民收入增长。

由上述分析可知，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是两架马车：投资是为消费和出口服务的[6]。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下，投资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超前增长，但只有在既定的时期及时转化为消费和出口能力才是有效的投资。经济要实现增长必须预先实现投资增长，而投资的增长会压缩消费的增长，这就是消费与积累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说，不能长期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不仅是避免外部影响的问题，而是生产的目的问题。出口是为了进口。一国一地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本国本地的消费使用，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水平，所以，本国居民消费的增长是最终的目的，单纯为出口生产是变相的殖民地经济。到本世纪中期即 2050 年，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总量以 GDP 度量还需要翻两番，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0000 美元增长到 40000 美元左右，因此在未来 15 年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低于 6%）仍然是必要的③，这就必须继续保持较高的积累率，维持固定资本形成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较高比例。

三、经济发展的产业进程

在一般文献中经常有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分析，普遍一个观点是，所谓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三次产业的划分在学术研究上现在是一个惯例，但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产业分类体系[7]。从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看，最早的产业分离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的分离和商业的分离。这种社会大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系统发展的基本规律[8]。吃饭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是第一位的，所以，在只有集中全部落的劳动力进行采集捕猎才能维持生命的生产力水平下，部落成员之间就很少完全专业化分工。当可以通过种植和养殖稳定获取大量生存物资并出现了相当量的剩余产品后，种植农业和畜牧业就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并出现了专业的、不生产的社会管理者（并逐渐形成统治阶级），于是生产生活用品的手工业者就出现了；随着农业生产工具需求的增加，相关的手工业就形成了，与此同时，就形成了市场，最后就出现了专门的商人，商业就形成了。这就是古代社会分工的发展方式。

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起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惯例上中文也叫产业革命）。首先是生产力的飞跃进步使得工业超过农业成为社会的最大产业。与之相配的运输业、商业同时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次，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相联系的金融业也进化和发展了，证券、保险、银行都成了社会的重要行业。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人口的集中，城市化形成了对餐饮、娱乐、商业和客运业的大规模需求，最后就形成了规模化的生活服务业。

在这第一波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中，首先是服务于工业生产的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获得了发展，其次是服务于人口集中生活需求的生活服务业获得了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些第三产业的发展完全是随着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

---

③ 以 2020 年为基础，人均 GDP 以 10000 美元计，实现 2050 年翻两番，若 2035 年前以 6%的速度增长，2035 年到 2050 年就必须以 3.5%的平均速度增长；若 2035 年前以 6.5%的平均速度增长，2035 年到 2050 年则可以 3%的平均速度增长。若 30 年匀速增长，则需要年平均增长 4.73%。

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物质生产部门内部服务活动的分离，而且得助于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剩余劳动力相似，物质生产部门在完成工业化之时，将有更多的劳动力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传统家庭内劳动的分离提供了条件，为更多人力资源从事科技文化活动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生活质量。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服务业获得了新一波发展的能量。原来处于实体产业单位内部的财务事务、法律事务、安保工作有一部分分离出来，发展了第三方服务业。为了降低成本、节约资本，催生了设备租赁服务业，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是细分层次的支柱产业。服务外包成为现代工业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诞生了一批包括产品售后服务和企业内生产技术与管理咨询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下的社会发展中，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是被逼到了极限的，日工作时间超过 10 甚至 12 个小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不断斗争，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劳动时间在不断缩短，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就产生了对生活性服务业的更大需求。原来只属于贵族和富人享有的家务服务成为许多工薪阶层的需求，形成了庞大的家政服务业。

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本国农业劳动提供剩余农产品，而且高强度剥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剩余产品。美国和西欧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入廉价工农业产品，更是通过诱引高素质人才剥削掠夺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由此实现了剩余劳动产品的国际转移。

在信息化社会，信息技术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各行各业的升级发展都在信息技术的催生下加速进行。信息技术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由以上对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全域广义上看，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是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展望未来社会，不仅工农业生产越来越自动化和无人化，家庭服务也逐渐走向智能化和机器人化。这一切既会为资本投入提供广泛的机会，也最终会挤压资本获取利润的机会，社会经济走向纯内涵式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主流生产方式，经济增长不再是宏观管理的追求目标。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夜。但是，在这之前，资本会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转移，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食利国。服务业在不同国家内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也会不同。在一些小国有可能服务业先行发展，依靠服务业成为富裕国家，甚至落后国家的服务业也会先于工业发展，如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南非等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都大于中国。

四、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与资本意义

共同富裕或共同幸福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的体现[9]。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在完全由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平均来讲，一线劳动者即无产阶级的收入一般仅够维持生活[④]。这里的平均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从一个人一生消费所需而言，二是从维持一个家庭的平均正常生活消费（劳动者的生活消费、养育子女

[④] 这里的生活不是维持基本生存水平的生活，而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一定富裕水平的社会生活需求相适应，即实现一定水平的衣、食、住、行、娱和教育发展要求的生活。

的费用、赡养老人的费用）而言，三是从全社会平均意义而言[⑤]。有人或许会说，在富裕社会中，大多数人或家庭都有相当数额的储蓄，在资本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有财产投资而获取收入。但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大多数家庭的储蓄平均也只够应急之需，一般大众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财产的收益不比银行存款利息高，赶不上通货膨胀。在这里，不排除个别人的幸运跳跃，从中产阶层甚至贫困阶层升级为富裕阶层，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最广大的大众不可能靠财产收益致富。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更必须发挥公有经济的保证作用，才能保证全体普通大众的共同幸福。

对于市场经济社会，减税在一定机制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不能保证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10]，为了破除经济滞胀的魔障，据说是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经营成本。有人非常欣赏里根时期，提出了里根经济学的概念。但是，里根时期虽然使美国走出了滞胀的泥潭，但是又进入了被惊呼为天文数字的巨额财政赤字漩涡，扩大了社会的贫富鸿沟，随后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周期。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面对经济危机和巨额财政赤字，采取了结构性增税、财政支出结构性增减的政策，最后财赤消灭，连续四年盈余，经济繁荣，一时让西方经济学家高呼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可以避免衰退性周期，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并发明“新经济”一词。但是，事实总是无情打脸，在 21 世纪初的 2001 年即出现了经济衰退，而且研究表明，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这个经济扩张期间[⑥]，收入的两级分化进一步扩大，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不仅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到 2001 年后，美国的财政赤字迅速恢复到里根政府时期的水平，并于 2008 年爆发被称为“金融海啸”的经济危机。近些年美国政府机构因为国会对预算赤字争辩两次关门（2013 年和 2018 年），多次面临关门的威胁。相比里根政府时期，现在的财政赤字才是天文数字，2020 年 3.13 万亿美元，2021 年 2.77 万亿美元，而国债总额更是超 30 万亿美元。2011 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99%起来反对 1%。

在理论上，对于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越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越快。因为，增长是要靠积累的，而积累就是增加资本投资，资本投资是以利润为向导的。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中，资本为私人所有，经济增长越快意味着资本获取的利润越大。因为私有经济在我国已经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高水平，这就造成了我国的基尼系数难以下降。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与美国相近，都是 0.4 多。但是，不能将二者等同评价，因为，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只有 3%左右，而我国曾长期接近 10%。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巩固，随着国家共同富裕蓝图的落实，我国的收入分配两极化将趋于缓和，基尼系数趋于下降。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再次提速，对削减基尼系数会有抑制。

[⑤]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也许个别小国可以成为食利国，如卢森堡、瑞士，但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社会中必然存在人数最多的一线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收入水平仍然是维持日常普通生活消费水平。在古代社会的每个朝代晚期，统治阶级及附属的人口（家族内人口、仆人、社会服务者）越来越多，其物质产品需求严重超出劳动阶级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导致赋税不断加重。现代资本主义则是创造了越来越大越多的奢侈需求产业和虚拟经济产业，这些会加重劳动阶级的生产负担。

[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的增长期加长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可以从统计数据得到验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稳定增长，与西方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宜工农业产品，另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质量不断发展的需求，这有效抑制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危机。所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强力稳定因子！

资本是市场的产物，其社会属性具有两重性。首先，它被其所有者用来获取利润，即超过本金的收益，称之为私人角色；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是社会积累的手段，社会经济通过资本运用实现增长，称之为社会角色。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个别资本的大规模扩张是偶然的，个别的，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资本的私人角色和社会角色是资本和资本社会中的一对矛盾。在私有制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其私人角色经常性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而社会角色作为资本的天然的和固有的属性，总是在为自己争取发挥作用的空间，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资本的社会角色属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经济危机迫使私人角色为自己让路，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提供服务。因为私人角色的主导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资本的社会角色力量会越来越强，最后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且公有资本起主导作用。公有资本的私人角色由公有资本的人格化功能执行者承担。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运用都受到国家的监督制约，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利以私有资本的代理者为主导，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权利是以人民大众的代理者身份为主导，因此，资本的私人角色在社会主义社会受到更强的监督，从而资本的社会角色有更强大的主导作用。

凡国家因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而组成，以政治制度为其运作引领，经济制度为其根本依赖。经济制度以社会之阶级结构为支撑。因此，制度在根本上是为人之利益服务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以最大资本的利益为准绳，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以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为准绳。在人之各种利益中，以经济利益最为基础，有经济才能生存和生活，然后才有政治和文化。然私人利益若没有公共利益的约束，则会泛滥膨胀，以私人利益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

从经济分配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总体收益首先被分成三块：劳动者个体（家庭）所得，资本所得，公共所得。以“蛋糕论”而言，总蛋糕是一，被三分。有分得增多者，必有分得减少者。分蛋糕的前提是做蛋糕。如果私有资本能够以其社会角色为主导，那么，从分配角度考虑，初次分配表面上的两极分化并不是问题，这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是生产结构发展方向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能充分制约资本的私人角色的贪欲，则社会的两极分化必然造成社会阶层矛盾的加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让资本成为“红色资本”，让资本的社会角色成为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做蛋糕和分蛋糕的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一种体现，社会的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得二者协调发展。既不能让做大蛋糕的说辞掩盖了分配不平的矛盾，也不能让平均主义的公平分配[7]说辞冲击了做大蛋糕的发展规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资本的运用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和引领角色。

参考文献:

[1] 刘新建. 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研究劳动价值论[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24-29.

[2]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经济理论创新组. 新经济学大纲 ——决定资源配

[7] 从辩证法看，公平和平等不等于平均分配，但两极分化的收入（社会产品）分配必定是不公平的。

置及其演化的规律[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3:25.
[3]刘新建.宏观经济学[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5.
[4]郑新华,贺兴华,姚铁崭等.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概述[J].网信军民融合,2021,(12):21-24.
[5]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速达8.1%_新闻_央视网(cctv.com). https://m.news.cctv.com/2021/01/26/ARTItw8H4mtNRHu7AM7LXQpH210126.shtml
[6]刘新建,房俊峰.经济增长动力的投入占用产出分析[J].管理评论,2018,30(5):95-100.
[7]邓凡.全国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1985(5):29-88.
[8]谢长安,程恩富.分工深化论:五次社会大分工与部门内分工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2):46-58+157.
[9]尹庆双,肖磊,杨锦英.人的全面发展：时代特质、内涵延展与理论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06):102-126.
[10](美)乔纳森·休斯(JonathanHughes), 路易斯· 凯恩(LouisCain).美国经济史: 第8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703-710.